

《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文学类》推荐书目

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

高中部分

# 宋诗选注

SONG SHI XUAN ZHU

钱锺书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文学类》推荐书目

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  
高中部分

# 宋诗选注

SONG SHI XUAN ZHU

钱锺书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诗选注/钱锺书选注. —3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

ISBN 978-7-02-009948-1

I. ①宋… II. ①钱… III. ①宋诗—青年读物②宋诗—少年读物 IV.  
①I22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1460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8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页1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2005年8月北京第3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948-1

定 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本着“体现核心价值,培育现代公民;关注当下生活,培养阅读习惯;立足开放多元,践行立体阅读”的理念,2013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教育报》、商务印书馆联合发布了《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意在提供一个开放式、兴趣性阅读的平台,拓展青少年的阅读视野,增强其课外阅读能力,让阅读真正成为一种“行动”。书目分初中、高中两部分,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社科、艺术、博物七个领域,所选入者均为相当有分量和代表性的作品。该书目的“文学”部分,重在“促使学生对社会与人生进行全面的观察、细腻的体味、深入的思考,并在丰富的审美体验中润泽文字、涵养心灵”,以及“引导学生发现更广阔、多元的世界,在丰富的情感体验中,培养朴素、务实的文风,提升思维能力”。文学关乎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成长,可以为青少年价值观的培育、人格的塑造、审美素养及语文能力的提升,提供有益促进和参照,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其书目均为“指南”所推荐。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作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该书的有关情况。相信这套书一定能够成为中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和家庭的必备藏书,并成为同学们“新阅读实践”的重要平台。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五月

## 导 读

宋诗存世二十五万余首,大约是存世唐诗的五倍。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宋诗似不如唐诗;但在专业读者看来,唐诗和宋诗,堪称“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国古典诗歌体式至唐大备,后世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形式,在这相对稳定的形式中,唐诗和宋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审美范式,元、明、清诗歌大体都可以划归到这两种范式中。如钱锺书先生《谈艺录》所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不像唐诗那样集中和相对直观地呈现诗人的精神风貌与深情雅韵,而是多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体验生活和表现生活,甚至把感情本身也作为理性考察的对象,以至“运思造境,炼句琢字,皆剥去数层,透过数层”(缪钺《论宋诗》),开出一条以思理取胜的诗歌新路。

相较众多声名赫赫的唐诗选本,宋诗选本不仅总量远为逊色,而且名头响亮的选本更少。古代以清人吴之振的《宋诗钞》和厉鹗的《宋诗纪事》较具代表性,今人则以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影响最大。

《宋诗选注》被列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发行后,至今已重印、再版二十余次,发行总量超过四十万册。它原是一本普及性读物,许多学者则将之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来对待,撰写了不少专题研究论文,可以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普及领域还是专业领域,《宋诗选注》的影响都持续不衰。

《宋诗选注》的内容分为序、选目、评和注四个部分。

序长达万余字,分三节。第一节谈宋诗的时代背景与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并以《宋诗选注》中的选目为例,指出宋诗的三种反映社会现实的方式。第二节谈宋诗的优劣和对宋诗的整体评价,指出宋诗的缺点是爱“模仿”、“剿袭”,“资书以为诗”,影响了其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能力;宋诗不善于写爱情,而“爱讲道理,发议论”;优点是在技巧和语言方面比唐人更为精益求精,“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总的评价是“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第三节交代选诗的标准,即“六不选”: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地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颂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另外指出选宋诗远较选唐诗为难,需要“尽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序言中的“六不选”坚持了艺术审美的标准,代表了钱锺书先生对中国诗学的基本看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文艺以政治为第一标准的大气候中,显得尤其珍贵。

选目上,在修订后共选诗人八十家,选录诗歌三百七十七首,其中绝句一百九十二首。所选诗人中,既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文天祥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名家,又有文同、王令、吕南公、唐庚、洪炎、李弥逊、董颖、华岳、刘宰、洪咨夔、罗与之、利登这样的中小诗家,从而挖掘出大批前人未曾重视但又确有价值的作家作品,使宋诗史的面貌顿改旧观,呈现出立体丰富的景观。

评和注是钱锺书先生的深心所寄,也是全书的核心价值所在。“评”是对所选诗人生卒年、姓名字号、籍贯、著述的介绍和对其诗

歌的评价。八十家诗人评论篇篇精彩,字字玑珠,贯串起来,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宋诗史。“注”是对“评”和所选诗篇的注释,但没有采用重视出典、字义、章法等传统笺注方式,而是重视对诗语的全面考索和对诗艺的多层次品鉴赏,特别是对诗歌审美因素嬗递演变的注释,往往穷源溯流,纵横古今,如注乐雷发《乌乌歌》,引书数十种,透彻解析了“道学亡国论”的来龙去脉。王水照在《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一文中对此书评、注特点有精准的论述,认为钱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在苦心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政治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逻辑学、方言学等广阔的文化背景,一切从具体特殊的审美经验和事实出发,对诗歌的题材、境界、风格、意象、句式、用语等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式鉴赏。“钱先生的注释,打破了传统选本着重于词语训释、名物阐释、章句串讲的框架,而是把注释和鉴赏、评判结合起来。……它的最大特点是使传统的直觉体验和主观感悟式的鉴赏,上升到理性的艺术规律性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先生是语言艺术大师,特别是对比喻的运用,更令人拍案叫绝。因此《宋诗选注》不仅见解博雅精到,而且语言幽默老辣,用了很多丰富生动的比喻。如他说那些脱离生活本身、抄书以为诗的人是“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序》);说那些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作品“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序》);说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的“护田”、“排闥”是“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词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注》);说王令诗歌语气的雄壮“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评》);说黄庭坚诗歌“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

成一片冰花”(《评》)。读起来叫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可以说是《宋诗选注》的一大特色。

关于这本书,1981年钱锺书先生接受香港记者彦火采访时说:“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各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钱锺书访问记》)1988年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又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平心而论,对于宋诗的欣赏,往往需要较多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在带有普及性质的选注本中,如果多选那些思理深致,能够鲜明体现宋诗特点的诗篇,显然不利于一般读者的接受与普及。那么尽量克制自己艺术趣味的钱先生,综合考虑了时代要求、普及性质与艺术审美标准,选入较多在内容题材上反映民生疾苦、表现民族气节、凝聚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和意境风格“浅明俊爽”的诗作,而在序、评、注中展开对宋诗较全面深刻的揭示,使人在春风化雨中对宋诗特点有所领悟与感受,这也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方法吧。《宋诗选注》是多种因素折中的结果,具有独特的文化复合价值,因此要把序、选目、评与注结合起来看,反复诵读咀嚼,才能入其心眼,得其大概。

张 剑



## 序

### —

关于宋代诗歌的主要变化和流派，所选各个诗人的简评里讲了一些；关于诗歌反映的历史情况，在所选作品的注释里也讲了一些。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几点。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1〕。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2〕。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3〕。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4〕；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5〕。宋初有人在

---

〔1〕 郝经《陵川文集》卷十《温公画像》，赵沅《东山先生存稿》卷一《观舆图有感》第五首自注。

〔2〕 《剑南诗稿》卷十二。

〔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五十四载吴伸《万言书》里还引了宋太祖那句话来劝宋高宗不要“止如东晋之南据”。

〔4〕 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费疏》。

〔5〕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费”条。

诗里感慨说,年成随你多么丰收,大多数人还不免穷饿:“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1〕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实,人民负担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选的唐庚《讯囚》诗就老实不客气的说大官小吏都是盗窃人民“膏血”的贼。国内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因国际的矛盾而抵触得愈加厉害;宋人跟辽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输的,打仗要军费,打败仗要赔款买和,朝廷只有从人民身上去榨取这些开销,例如所选的王安石《河北民》诗就透露这一点,而李觏的《感事》和《村行》两首诗更说得明白:“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平时不为备,执事彼何人……”〔2〕。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3〕

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单就下面选的作品而论,也可以看见几种不同的方式。

下面选了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劄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这是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唯一

---

〔1〕 张咏《乖崖先生文集》卷二《悯农》。

〔2〕 《李直讲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3〕 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题黎芳洲诗集》引了这两句,还说:“所谓长歌之哀非耶?”

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下面选了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sup>[1]</sup>。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

---

[1] 参看亚理斯多德《诗学》第一千四百五十一(乙)、一千四百六十(乙)。《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鉏麇自杀以前的独白,古来好些读者都觉得离奇难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为既然是独白,“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麇论》)。但是对于《长恨歌》故事里“夜半无人私语”那桩情节,似乎还没有人死心眼的问“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或者杀风景的指斥“临邛道士”编造谎话。

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1〕。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消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从韩元吉的记载里,看得出北方虽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里的人民还是怀念祖国〔2〕。范成大的诗就是加强的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所以那样真挚感人。

下面选了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注释引了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说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异族的统治。这是又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咏怀古迹的诗虽然跟直接感慨时事的诗两样,但是诗里的思想感情还会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记,恰像一首咏物诗也可以诗中有人,因而帮助读者知人论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里面说:“那知平地有青云,只属寻常避世人……何事区区汉天子,种桃辛苦求长年!”〔3〕这首诗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时候作的〔4〕,寄托在桃花源上的讽喻就跟萧立之诗里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谈之类的长诗、邹浩的《悼陈生》〔5〕,诗很笨拙,但是叙述的可以说是宋版

---

〔1〕 例如《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六十八载杨造《乞罢和议疏》讲到沦陷的人民,就说:“窃恐岁月之久,人心懈怠。”

〔2〕 参看辛启泰辑《稼轩集钞存》卷一《乾道乙酉进美芹十论》里《观衅》第三。

〔3〕 《浮溪集》拾遗》卷三。

〔4〕 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六。

〔5〕 《道乡集》卷二。

的桃花源〔1〕。有个宁波人陈生，搭海船上南通泰县一带，给暴风吹到蓬莱峰，看见山里修仙的“处士”，是唐末避乱来的，和“中原”不通消息：“于今天子果谁氏？”语罢默默如盲聋；这位陈生住了一程子，又想应举做官——“书生名利浹肌骨，尘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个处士用缩地法送他回去，谁知道“还家妻子久黄壤，单形只影反匆匆”，陈生就变成疯子。邹浩从他的朋友章潜那里听到这桩奇闻，觉得秦始皇汉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陈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两莫遂，我虽忘情亦歛歔；仲尼之门非所议，率然作诗记其事。”邹浩作这首诗的时候，宋徽宗还没有即位，假如他听到这个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释教，以他那样一个援佛入儒的道学先生，感触准会不同，也许借题发挥，不仅说“非所议”了。邹浩死在靖康之变以前，设想他多活几年，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苦痛，又听得这个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样一个气骨颇硬的人，感触准会不同，也许他的“歛歔”就要亲切一点了。只要看陆游，他处在南宋的偏安局面里，耳闻眼见许多人甘心臣事敌国或者攀附权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气节拍合起来〔2〕，何况连残山剩水那种托足之地都遭剥夺的萧立之呢？

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像保留在《宣和遗事》前集里那几节，所谓“见于街谈巷语”〔3〕。这些诗人十之八九从大大小小

---

〔1〕 这桩奇闻当时颇为流传，例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就有详细的叙述，还说：“又闻舒信道尝记之甚详，求其本不获。”南宋初康与之《昨梦录》记杨可试兄弟被老人引入“西京山中穴”，内有“大聚落”，可供隐居，也正是桃花源的变相。

〔2〕 《剑南诗稿》卷二十三《书陶靖节桃源诗后》：“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

〔3〕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载龚开《宋江三十六赞》。

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经过科举保举,进身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有爱国的立场;在阶级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反对苛政,怜悯穷民,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假如人民受不了统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枪的对抗起来,文人学士们又觉得大势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1〕;北宋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了威胁,连这一点点“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直到南宋灭亡,遗老像龚开痛恨“乱臣贼子”的“祸流四海”,才想起宋江这种“盗贼之圣”来,仿佛为后世李贽等对《忠义水浒传》的看法开了先路。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2〕,不像在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3〕。

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刘壘为曾巩的诗辩护,曾说:“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寡,先生之诗亦然。故惟当以赋体观之,即无憾矣”〔4〕。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

---

〔1〕 魏禧《魏叔子诗集》卷一《读〈水浒〉》第二首:“君不择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于此!”

〔2〕 例如宋庠《元宪集》卷十《坐旧州亭上作,亭下是梁山泊,水数百里》:“长天野浪相依碧,落日残云共作红;鱼缶回环千艇合,巷蒲明灭百帆通”;韩琦《安阳集》卷五《过梁山泊》,苏辙《栾城集》卷六《梁山泊》,又《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第五首:“菰蒲出没风波际,雁鸭飞鸣雾雨中;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

〔3〕 例如《元诗选》三集庚陆友《杞菊轩稿·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十七《分赃台》(参看李贽《焚书》卷五《李涉〈赠盗〉》条),朱彝尊《明诗综》卷五胡翰《夜过梁山泊》,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五载丘海石《过梁山泊》。

〔4〕 《隐居通议》卷七。

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同时,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像朱淑真《断肠诗集》里的作品,实在浮浅得很,只是鱼玄机的风调,又添了些寒窘和迂腐;刘克庄称赞李壁的《悼亡》诗“不可以复加矣!”〔1〕可是也不得不承认诗里最深挚的两句跟元稹的诗“暗合”〔2〕。以艳体诗闻名的司马槲,若根据他流传下来的两首诗而论〔3〕,学李商隐而缺乏笔力,仿佛是害了贫血病和软骨病的“西昆体”。有人想把词里常见的情事也在诗里具体的描摹,不过往往不是陈旧,像李元膺的《十忆诗》〔4〕,就是肤廓,像晁冲之《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5〕,都还比不上韩偓《香奁集》里的东西。

---

〔1〕《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五。

〔2〕《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

〔3〕陈起《前贤小集拾遗》卷五《闺怨》。

〔4〕见《墨庄漫录》卷五。

〔5〕《具茨先生诗集》卷十三。

## 二

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连他们里面都有人觉得“不已甚乎!”〔1〕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2〕,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3〕。在晚清,

---

〔1〕王若虚《溇南遗老集》卷四十。王若虚是师法白居易的,所以他说宋诗“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算得一句平心之论,正像瞿佑《归田诗话》卷上论“举世宗唐恐未公”或者叶燮《己畦文集》卷八《黄叶村庄诗序》和《原诗》卷一论“因时善变”或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引申都穆《南濠诗话》那几节一样,因为那些人也都是不学宋诗的。

〔2〕叶盛《水东日记》卷十记苏平语;那首诗是王珪的《恭和御制上元观灯》,见《华阳集》卷四。

〔3〕《古今诗删》卷二十二以李建勋和灵一结束,卷二十三以刘基开始;参看屠隆《鸿苞集》卷十七:“宋诗河汉,不入品裁”,又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十五《皇明诗选序》说宋诗跟明诗等不是“同类”而是“异物”。就因为讨厌何、李、王、李等前后“七子”的“复古”,明代中叶以后的作者又把宋诗抬出来,例如“公安派”捧得宋诗超过盛唐诗,捧得苏轼高出杜甫——参看袁宏道《瓶花斋集》卷九《答陶石簒》、陶望龄《歇庵集》卷十五《与袁六休书》之二;又谭元春《东坡诗选》载袁宏道跋、卷一《真兴寺阁》、《石苍舒醉墨堂》、卷五《赠眼医王彦若》附袁宏道评语。黄宗羲《明文授读》卷三十六所载叶向高《王亦泉诗序》、卷三十七所载何乔远《郑道圭诗序》、《吴可观诗草序》和曾异撰《徐叔亨山居次韵诗序》也全是有意于“七子”的“复古”而表扬宋诗的,同时使我们看出了清初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陈衍等人提倡宋诗的渊源,有趣的是,许多宋人诗句靠明代通俗作品而推广,只是当时的读者未必知道是宋诗。举三个显著的例:《荷花荡》第三折里玉帝说的“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是苏轼《上元侍饮楼上呈同列》第三首,见《苏文忠公诗集》卷三十六;《鸚鵡洲》第三折里女巫说的“暖日薰杨柳,浓春醉海棠;放慵真有味,应俗苦相妨”是陈与义《放慵》前半四句,见《简斋诗集》卷十;《金瓶梅》第八十回的“正是‘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是黄庭坚《王厚颂》第二首后半两句,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五。参看宣统二年《小说时报》第六期《息楼谈馀》记载赣州“清音班”唱本里所用黄庭坚的各联诗句。



“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1〕。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的赶任务。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著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2〕,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

〔1〕 施山《葺露庵杂记》卷六。

〔2〕 例如何景明《何氏集》卷二十六《读〈精华录〉》:“山谷诗自宋以来论者皆谓似杜子美,固余所未喻也。”